

汉代学术史论

熊铁基
著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汉代学术史论

HANDAI XUESHUSHI LUN

熊铁基
著

内容简介

本书研讨了汉代学术史的一些主要问题,对学术载体的演变、学术史的主要内容、学术的发展及其特点、规律,以及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揭示了中国学术史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关于汉代学术思想的趋同和整合、新儒家和新道家的形成、汉人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家之言。对汉代辉煌学术成果的阐述,也具有独特视角。

与一般的学术史的综合论述不同,本书着重探讨了汉代学术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从汉代学术本身和整个传统学术文化发展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视角新颖;在对汉代学术史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老资料的运用和新资料的采掘等方面,特色鲜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学术史论 / 熊铁基著.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04-036429-3

I. ①汉… II. ①熊…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汉代 IV. ①B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2613号

策划编辑 梁宝贵 责任编辑 梁宝贵 封面设计 张志奇
版式设计 马敬茹 责任校对 金 辉 责任印制 张泽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 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北京市四季青双青印刷厂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http://www.landraco.com.cn
印 张	29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插 页	2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 价	5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购书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6429-00

作者简介

熊铁基，1933年生，湖南常德人。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1958年华东师范学院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家，著名秦汉史学者。长期从事秦汉史研究，撰写并出版了多部秦汉文化史、制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著作，为秦汉史学界所推重，影响较大。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探索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奥秘、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其研究能力和科研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真正强大的国家。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党中央在新时期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长期以来，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科学，甘于寂寞，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振奋精神，锐意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思想库作用，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II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社会事业，是一种繁重而复杂的创造性劳动。精品源于艰辛，质量在于创新。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态度，离不开辛勤的劳动，离不开创新。树立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名逐利的良好学风，是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营造有利于学者潜心学问、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为此，自2006年始，教育部实施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计划，旨在鼓励高校教师潜心学术，厚积薄发，勇于理论创新，推出精品力作。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欣然为后期资助项目题字“厚积薄发”，并篆刻同名印章一枚，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亦为此题字“生也有涯，学无止境”，此举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展望未来，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宏伟目标和崇高使命，呼唤着每一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和智慧。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以优异成绩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前 言

“汉代学术史论”，这个很一般但名副其实的书名，最近才定下来，也是最近才想出来的。从我开始写“汉代学术史”到现在整整5年，完成了70%以上的写作，才觉得这个书名最合适。

为了让读此书的朋友了解我的写作缘由和简单历程，我想从头说起。

30多年前，20世纪70年代末，我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时候，由一般的学、教中国古代历史（重点学习和研究过明清史、隋唐史、农民战争史），转为专攻秦汉史，着重研究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后来陆续出版过几本专书，属于大的文化范围，所谓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之类。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一些学术会议的影响和促使下，我先后编写了《中国老学史》、《中国庄学史》，又进入学术史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忘记和丢掉秦汉史，“老学史”、“庄学史”也主要撰写秦汉部分，最多延长到唐，与我的《汉唐文化史》结合起来。2002年写完了《中国庄学史》，我很快就考虑了“秦汉学术史”的问题，具体的心路历程已经记不得了，事情（工作）还是比较多的，好在开始写“汉代学术史”时的一些简单记录，提供了一点线索。

几年前的书稿上有一行小字写道：“2003年4月30日下午开始。”（当时是“非典”时期，月初有亲人病逝于“非典”）翻看流水账式的日记，和往年一样，此时正当大忙季节，博士生入学、论文答辩等一系列活动，当时还办了一个道教文化讲习班，等等。4月30日当天记录是：“看学术史”、“下午3时以后开始写汉代学术史，一个多小时，定第一章提纲，300字。”在这之前，有一些阅读学术史著作的记录。3月31日有一句“写顾颉刚纪念会发言提纲”的记录（当年8月的纪念会我因为在美国未能参加）。显然，我写“汉代学术史”是与顾先生的《汉代学术史略》（后名《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有密切关系的。顾先生虽然已经开辟了 this 领域，但因为许多方面“大都没有叙及”而对读者深感“歉意”。我之所作将是继承顾先生的遗愿。当然我也知道，当时

有一两种学术通史正在撰写，秦汉部分会有一大卷。写作开始时，又才知道华东师范大学的王铁同志早在1995年已经出版了一本《汉代学术史》，于是托当时刚去华东师范大学的牟发松同志代为索要了一本，王铁同志赠书落款的时间是“2003年5月”。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读王著之后觉得还可以写，因为我想写的有所不同。写到中途，又看到《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周桂钿、李俊先生合著），仍感到可以继续写，同时也逐渐有点明确，我侧重在“发展”二字，或可名叫“汉代学术发展史”。

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没有最后完成？一是多少还有些工作和活动，特别是这几年参加了一些道教界的活动（主要是研讨会），经常还写一点“急就章”，如有些朋友感兴趣的《人皆可以成神仙》之类的小文章。二是没有压力，不是什么课题任务。在此期间两次申请社科基金，一次在哲学方面申报，大约因为此前得到过一次，虽然完成了，但也得给他人一些机会；另一次在历史学方面申报，好像初审通过了（当时似有公布），终审未能通过。当然，主要原因应该是还看不出明显的优势，亦非“规划”之内的。没有立项，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慢慢来，当然始终没有放弃，只是拖的时间长一点。意外的好处是可以经常思考，反复琢磨，更有利于形成某种特色，结果这倒说明是有好处的。

开始碰到的问题是：写一个老题目，如何能不一般化？能否与已有的学术史有所不同？首先我想到的是“学术载体”问题，就是书中的第二、第三两章。一般的著述没有记述它，但它对于学术的发展是有很重要意义的。我所讲的载体——人和书这两点至关重要，它们具体反映学术内容、成就、水平和发展变化等，比较集中地研讨它们，对于深入了解学术是重要的，甚至还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其次，在载体的研究中，自然就突出地看到一个发展变化的问题。因此，书稿上的“汉代学术史稿”就变成了申报课题时的“汉代学术发展史”。这个“发展”是贯彻到最后的，写学术成就时，也想要有点特色，每一个小标题都体现这种思想，如：“注疏之学的发展——中国解释学的形成”、“从数术到谶纬——中国的神秘学的形成”之类。而“子学与汉代诸子”就是讲先秦诸子在汉代的传承，以及汉代诸子的特色，多多少少都是以发展的眼光记述的，其他如史学以及天、地、农、医等自然科学都是如此。

再次，既然要讲学术发展，就得考虑影响甚至决定其发展的诸多因

素，本书除了注意到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认为政治的影响是最大的，于是设立“重大举措”一章，按照时间顺序，择要列举了一些重大的政策措施和重要的学术性的会议，诸如博士制度、讲论经义、图书的搜集和整理等。这些“重大举措”都是有很大且深远的影响的，它影响着社会风气、士人心理和志向，与当时的学术发展息息相关。

既然讲发展，还必定涉及规律、特点和地位等诸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与西方和中国现代分科学术不同，其明显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学术”，早在1993年我写《秦汉文化志》时，就曾以此为章名，概述秦汉时期的学术。与“综合性”这一特点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阐释，例如“经世致用”、“道不离器”、政治性、正统性、连续性等，这些特点都在汉代学术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甚至可以说是在汉代形成的。

另外，“综合性”这一特点本身又是在学术发展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变化的，所以再列出“学术思想的趋同与整合”一章，用几个突出的具体的事例加以论说，如“汉人如何看待先秦诸子”、“秦汉新道家”、“汉代新儒家的形成”，等等。

在几年来的撰写过程中，有些看法和想法曾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有的也是因友人的索要），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看法，例如曾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一文，说明如何看待传世的先秦典籍，如何看待汉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等。这些观点在其他文章中也有所呈述，应该说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今年考博的研究生就有几位加以引述，这当然不足为怪，但至少说明他们注意了而且思考过。要讲同行学者的关注，有成文的材料更好，恰好2007年12月7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李振宏同志（史学月刊主编，秦汉史学会副会长）的大作——《汉代文化研究需要引起新的重视》，该文的第二部分开头写道：“熊铁基先生说：‘后世流传至今的群经诸子，都是汉代的東西，是汉人传授、整理过、甚至重新编定的东西。’熊先生这话很有见地，他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问题。”彭卫同志（《中国史研究》主编，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和我通电话时开玩笑说，振宏引用你的“语录”了。这当然是玩笑话，说实在的，振宏的引述恐怕不一定是原文，但说“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这话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并非什么过分“赞扬”之词，而是他——甚至可说是他代表了一些人对这一问题的相同看法。因为这一问题，还牵涉其他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如我曾写过的《重新认识古书辨疑》即为问题之一，顾

IV 前 言

颉刚先生写《秦汉学术史略》似曾有汉人“造假”（也许这也不是一个准确的表述）之说，进一步涉及“疑古”与“走出疑古”之类的问题，等等。这些虽然越说越远，但确实是学术史上的理论问题，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更为准确表达的说法。这里我顺便郑重地感谢我的“知音”们。

这里已经讲到“论”了，回头看这几年来发表的有关文章，都多少带有“论”的性质，与开始的“汉代学术史稿”、后来的“汉代学术发展史”都不太一致。现在已经申报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应该有一个名副其实的书名，忽然想到这个“论”字，我问身边的赵国华同志，可不可以叫“史论”，他说当然可以，侯外庐先生就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想起来了，再找来一看，好了，对了，就叫“汉代学术史论”。

最后一点要交代的，从历史学的眼光看，秦汉历史难以分割，所以多半秦汉相连，我也写过《秦汉官制史稿》（与安作璋先生合作）、《秦汉军事制度史》、《秦汉文化志》、《秦汉文化史》、《秦汉新道家》，皆秦汉相连，唯独这个学术史，一开始就感到不能用“秦汉”，秦代的“灭学”、尊法（当然可以具体分析“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之类），与汉代的尊儒、重经基本上可说是两码事。当然，作为背景是应关照秦代的，特别是汉初的有些问题，直接与秦代有关，但如果要写秦代，在书中也该单独列篇。

这中间包含着一些论文，所以有些材料、观点反复出现，刚刚削过一些，有些地方删也不好删，但又并不完全是一个论文集，这与写学术史的初衷有关，是想以一个较新的面貌把汉代学术史呈献在人们面前。

信手写上一些话，平铺直叙，但比较真实（因为时间长了，有记忆不确的地方，用“比较”二字更合适）。

目 录

第一章	汉代学术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1
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与发展大势	1
二	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及其实质	5
三	汉代政治历史的主要特点	10
第二章	汉初的学术载体	15
一	汉初的学术传人	15
二	汉初的图书流传	27
第三章	两汉学术载体的演变	32
一	图书的集散与传世本的初定	32
	(一) 西汉图书集散之概况	34
	(二) 东汉图书集散之概况	44
	(三) 传世古籍的初步定型	54
二	两汉士人的学习与贡献	67
	(一) 师承的演变	67
	(二) 博通与专精	73
	(三) 入世与归隐	78
	(四) 贡献与作用	84
第四章	影响学术发展的重大举措	109
一	博士制度的形成、演变及其影响	109
二	“贤良对策”及其意义和影响	116
三	石渠阁“会议”的意义	125
四	刘向父子校书	129
	(一) 校书的时间和群体	129
	(二) 校书的方法和结果	131
	(三) “条其篇目”与“撮其旨意”	136
	(四) “书录”和《七略》	139
	(五) 对刘向父子校书的重新认识	144

五	东汉初年的文化政策	146
六	君臣讲经与白虎观“会议”	151
七	兴学与校书的制度化	155
第五章	论学术思想的趋同与整合	165
一	汉人如何看待先秦诸子	165
(一)	思想派别不同是客观存在	165
(二)	战国时已有不同思想的分类	167
(三)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170
(四)	司马迁关于先秦诸子的评议	171
(五)	《汉书·艺文志》中的学派划分及其主要观点	173
(六)	诸子百家及其争鸣的总特点	178
二	论汉代新儒家	188
(一)	先秦儒家的演变	189
(二)	汉初儒家的状况	191
(三)	董仲舒是汉代新儒家的理论代表	195
(四)	汉代新儒家的演变	201
三	论秦汉新道家	203
(一)	关于学派的划分与秦汉新道家	204
(二)	关于秦汉新道家的特点	206
(三)	兼采各家思想并非千人一面	209
四	汉代经学垄断地位的确立及影响	210
(一)	“五经”地位的崇高与诸子学相对的削弱	212
(二)	经学的专精与传注之学的发达	213
(三)	官学的主导作用和私学的蓬勃发展	220
(四)	经学垄断的影响	227
五	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	231
(一)	先秦典籍在西汉时的流传	231
(二)	传授中的变化和不同	234
(三)	官方的校书和讨论	240
(四)	几点认识	245
第六章	传统学术特点的形成	248
一	道不离器的综合性	248
二	经世致用的政治性	253
三	解读诠释的连续性	259

四	综论诸特点	267
五	规律和特点	269
第七章	辉煌的学术成果	272
一	注疏之学的发展——中国解释学的形成	272
二	从数术到讖纬——中国神秘学的形成	283
(一)	数术和方术	283
(二)	讖纬之学	289
三	子学与汉代诸子	297
(一)	汉代的子学	298
(二)	汉代诸子	300
四	中国古代史学基本形态的确立	322
(一)	司马迁与《史记》	323
(二)	班固与《汉书》	327
(三)	东汉其他史家与史籍	336
五	世界一流的天文、地理之学	345
(一)	论天三说	345
(二)	天象记录和历法改进	349
(三)	与天文学相关的学问及数学	354
(四)	数学体系的形成	355
(五)	地理知识和地学著作	358
六	根底深厚的农学与水利学	366
(一)	汉代农业生产的水平	366
(二)	农学著作与农学思想	373
(三)	水利工程技术 and 学理	381
七	既唯物又辩证的中医学	389
(一)	汉以前医药学的发展	389
(二)	医药学体系的充实和提高	392
(三)	《神农本草经》	405
(四)	医圣张仲景	408
(五)	神医华佗	410
八	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创立	412
(一)	道教产生诸问题再探讨	412
(二)	道教的文化意蕴	421
	后语	434

IV 目 录

主要参考文献·····	438
重要人物人名索引·····	443

第一章 汉代学术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本章撰写基于两个理念：一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二是文化的承传性。因为历史的事实确实如此。

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与发展大势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或可称之为社会转型时期。急剧的变化有两个突出表现：一个是“礼崩乐坏”，传统的社会政治局面被打破，在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土地制度（“废井田，开阡陌”之类）、赋税制度（“初税亩”、“初租禾”之类）等都相继发生重大变化，财富的拥有情况也不断变化，例如军功爵赏，可以“利其田宅”^①，可以“赐之上田上宅”^②，还有“辟草莱”^③、“除井田，民得买卖”^④，等等。新的财富拥有者，成为新的阶级力量，相应地政治上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改革，各诸侯国的各种“变法”运动，如吴起变法、商鞅变法就是鲜明的事例。所有的变化虽然反映着历史的进步，但遭到的抵制和反对也是很大的，对于守旧派来说那就是“礼崩乐坏”、“是可忍孰不可忍！”。这虽是孔老夫子的话，不过，终究一切变化都发生了。

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另一表现就是兼并战争。从春秋开始，争城夺地之战就时时处处发生，到战国时形成齐、楚、燕、赵、韩、魏、秦七个大国并立的局面，时而合纵，时而连横，各国之间都发生过规模不同的战争，有人大致统计，见于记载的大小战役不下200次，这些战争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是灾难性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

①《荀子·议兵篇》，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

②《韩非子·内储说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

③《孟子·离娄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

④《汉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7页。

战，杀人盈城”^①。秦国攻取楚国郢都，引水灌城：

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②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秦将白起活埋了赵军40多万人^③，双方在战争中死伤的人数更多。最受苦、遭殃的是老百姓（包括士兵）。经济的损失当然也是非常惨重的，当时苏秦描述战后的情况说：

夫战之明日，尸死扶伤，虽若有功也，军出费，中哭泣，则伤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酺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钧。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④

此虽策士游说之词，但以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并不算太夸张，所有一切费用均转嫁到人民的头上，更是确定的事实。

以上两方面的突出表现，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以《史记》为例，在不少篇章中都有一定的概述，兹举例如下：

平王之时（按：即一般所谓东周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⑤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⑥

①《孟子·离娄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

②《水经注》卷28《沔水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9年版。

③事见《史记》卷73《白起列传》。

④《战国策》卷12《齐国策》，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

⑤《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9页。

⑥《史记》卷23《礼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59页。

自是之后（按：春秋时期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①

所有这些描述，应该说都是当时客观情势的反映。至于对这些历史变化今天该如何看待，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如果从平王东迁算起（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约有550年，春秋时期300多年，战国时期近200年。是否这500多年都称为社会转型期？这是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也许在生产力、经济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这个时期是要长一些。事实是，春秋时开始的一些变化都是在战国时完成或者结束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春秋战国的转型，是何种性质的转型？学者们曾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来探讨这种转型，有的学者认为是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即所谓战国封建说（郭沫若）；主张西周（如范文澜）或者春秋（如李亚农）开始封建社会的学者，则认为是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主张秦汉或魏晋开始封建社会的学者中，有的认为是从早期奴隶制到发达奴隶制的转变。由此可见，大家都认为，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的历史转变是重大的、根本性的。但是从具体事实看，无论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一些可以反映整个社会转型的具体制度，都是一个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很难找出一个十分明确的具体时段，更难以用哪一个历史事件作为明确的界标。这样，也只能把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看成转型期。

如何看待这个漫长的转型期？一方面可以肯定，整个社会是一种进步的转型；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到，这种进步有很浓的血腥味，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

兼并战争这一现象发生在历史的转型期，既受社会转型的影响，也影响社会的转型，乃至形成了另一种发展趋势——由分裂割据逐渐走向统一，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中国，以及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中华民族。我们将要论述的汉代、汉王朝，就是这个发展的重要结果。

兼并战争，是起于“诸侯强并弱”。原来“统一”的周王朝，实行

①《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2页。